

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呂春盛*

提 要

山越是三國時代孫吳立國於江南所面臨的最大內患，然而在孫吳政權幾十年的征討與統治之後，卻驟然消失。近代學者對山越族屬之爭議，依其對山越集團之界定寬鬆，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山越論。前者認為，山越雖有部分古越人之後裔或江南土著，但其中大部分卻是亂世之中開闢山區或逃往山區規避賦稅徭役的漢族人民。後者認為，只有古越人後裔才是山越。然而，史籍所見的山越，常被描述為蠻夷之類的化外之民，整體上是被當時的人視為是「非我族類」的異族。

三國時代的山越，幾乎遍及孫吳全境，如此廣大地域的居民，當然不可能是成員彼此認同的特定族群。商周時期已有越族，但要到春秋晚期越之名始大顯於世，戰國晚期越似已成為東南沿海各族的泛稱，並出現「百越」一詞，戰國末到西漢初，東南各地又出現許多與越有關之國名或族名，越之概念逐漸擴大為泛指江南廣大地域之異族。東漢末年出現「山越」一詞，而三國時代反抗孫吳統治的山區各族群，遂都被統稱為山越。

以往學者對山越的消失，都認為是融合於漢族之中。然而，筆者認為山越不可能全部被漢化，山越的消失只是「山越」一詞用法之消失，原山越之各種族裔在兩晉以後轉化以各種不同的族稱呈現，這種族群轉化的現象，乃是與大量漢人南下對各地加深開發，產生新的族群認識有密切的關係。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關鍵詞：山越 族群關係 三國時代 六朝 孫吳政權

一、前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族群紛擾極為嚴重的時代，北方自五胡諸國的建立至北魏、北齊、北周的興亡，皆由游牧民族及其後裔所主導，「胡漢問題」成爲北朝最嚴厲的歷史課題之一。相對的，南方的土著族群未曾建立政權，反而長期受到逃難南遷的華北漢人所統治，或許如此，南方土著族群的研究似乎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然而，南方的土著族群對於魏晉南朝的歷史發展，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筆者近幾年致力於南朝陳政權的研究發現，陳朝的興亡都與南方土著族群的動向有密切的關係。¹基於這種認識，筆者擬對魏晉南朝的南方土著族群再做進一步的研究，於是留意到三國時代的山越問題。

山越是三國時代孫吳立國於江南所面臨的最大內患，從孫策立足於江東，到孫策死後孫權繼立穩住政局以至登基稱帝，再到孫吳政權衰亡，都面臨到山越的反叛與征討山越的問題。²《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對此曾評論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³即由於內部受到山越強大的威脅，致使孫權對曹魏示弱以自保。陳壽之言應有相當的根據。考之當時形勢，曹魏確實也曾百般要利用孫吳內部這一股勢力以爲內應。⁴然而山越這樣一股強大的勢力，卻在孫吳政權（西元 222 年—280 年）幾十年的征討與統治之後，驟然消失。孫吳滅後，六朝史籍幾乎不再見到有關山越的記載。⁵誠然，孫吳對山越之征討與

¹ 參見拙著《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 3 月），第 6 章〈陳朝內部的弱點及其滅亡〉，頁 185-238。

² 呂錫生認為，一般史書或論著有誇大山越對孫吳威脅之嫌，參見呂錫生，〈山越在東吳立國中的作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4 年第 3 期，頁 63-68。不過筆者認為山越是孫吳最大之內憂，不論如何是難以否認的。

³ 參見新校本《三國志》卷 60，〈吳書 15〉卷末之評論，頁 1395。本文所引正史版本若無特別注明，皆指新校本而言。

⁴ 參見關尾史郎，〈曹魏政權與山越〉（中譯文），《文史哲》1993 年第 3 期，頁 30-33。

⁵ 關於孫吳滅後之山越史料，僅在《陳書》卷 3〈世祖紀〉，見到陳霸先任命陳蒨爲會稽太守討伐山越（頁 46），此後隋唐史籍又見數例山越史料，但由於時間或空間相隔久遠，這些史料所載之山越與三國時代之山越是否仍有關連，頗可存疑。參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蠻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史學雜

統治極為嚴酷，通常在一番大肆討伐之後，搜括其民以為驅使，所謂「疆者為兵，贏者補戶」。⁶然而在短短幾十年之間，山越就如此消失了，這點頗讓人有所不解，不禁要問，山越真的是完全被消滅或同化了？或者山越到哪裡去了？由此又進一步思索山越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族群？

據一般民族學者的研究，山越是百越民族的一支，中國學者稱之為少數民族，這幾乎已經是一個定論。⁷然而以往也有學者對山越之族屬，提出一些質疑，如呂思勉認為，山越大多是亂世避難山谷之中國人；⁸井上晃、唐長孺亦認為山越大多是亂世之中逃往山區規避賦稅徭役之漢族人民。⁹顯示關於山越的族屬問題仍有討論之餘地。其次，做為三國時代南方的土著族群，山越的盛衰代表何種歷史意義？東晉南朝境內幾乎未再見到山越活動的蹤跡，但仍有各種土著族群如蠻、溪、俚、獠等的活躍，到底三國時代的山越與這些土著族群有何種關係？這些都是值得再做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本文擬先由回顧近代學者對山越族屬問題的研究入手，釐清山越的內涵問題，再由此探討山越族群的特色，最後以山越的興衰為例，略論六朝時代的族群現象。

二、關於山越族屬問題的研究討論

誌》95 編 8 號（1986 年 8 月），頁 37-38。該文又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 年）；呂思勉認為，史籍所見隋唐時代之山越，「未必魏晉屯聚之遺，特史襲舊名之耳」，參見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8 月）乙帙〈秦漢·山越〉條，頁 582。

⁶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頁 1344。

⁷ 這種見解非常的普遍，舉其犖大者：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等著，《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5 月）第 10 章〈山越〉，頁 279；王文光編著《中國南方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3 章第 1 節〈山越的由來、分布與民族關係〉，頁 104。

⁸ 參見前引呂思勉，《讀史札記》乙帙〈秦漢·山越〉條，頁 576-582。

⁹ 參見井上晃，〈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史觀》第 17 冊（1938 年 10 月），頁 57-68；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頁 3-29。

現存史籍中，山越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孝靈帝紀》：「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¹⁰這是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九月的事情，《資治通鑑》引錄了這條材料，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¹¹亦即胡三省認為山越是越人之後裔，住在山區，不向政府繳納賦稅。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山越條》認為：「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¹²即山越是伏處深山的百越，而百越又是南蠻之總稱，換言之，山越是泛指當時住在深山的南方異族。

然而，近代有些學者則稍有不同的看法。呂思勉在其《讀史札記·山越條》，認為史書所載漢末為患之山越，大多是中國人：

夫越之由來亦舊矣。乃終兩漢之世，寂寂無聞，至於漢魏之間，忽為州郡所患苦、割據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驟盛，乃皆亂世，民依阻山谷，與越相雜耳。其所居者雖越地，其人固多華夏也……蓋山深林密之地，政教及之甚難。然各地方皆有窮困之民，能勞苦力作者，此輩往往能深入險阻，與異族雜處。初必主強客弱，久則踵至者漸多，土雖瘠薄，然所占必較廣；山居既習儉樸，又交易之間，多能賒夷人以自利，則致富易而生齒日繁。又以文化程度較高，夷人或從而師長之。久之，遂不覺主客之易位。又久之，則變夷而為華矣，此三國時山越之盛，所以徒患其阻兵，而不聞以其服左衽而言侏離為患；一徙置平地，遂無異於齊民也。¹³

呂思勉認為，兩漢時期已有許多中國人深入越地開墾或規避徭役，漢末為患之山越，實際上大多是先前進入山區越地開墾或規避徭役之中國人，即使其中有越人，

¹⁰ 《後漢書》，卷 8〈孝靈帝紀〉，頁 330。

¹¹ 《資治通鑑》，卷 56〈靈帝建寧二年九月條〉，頁 1817。

¹²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 42〈山越條〉，見楊家駱主編《王鳴盛讀書筆記十七種一》（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377。

¹³ 前引呂思勉，《讀史札記》，乙帙〈秦漢·山越〉條，頁 578-579。按呂思勉《讀史札記》是呂思勉（生於 1884 年，卒於 1957 年）的遺著，198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有關山越部分不知其寫作年代，姑列於近人討論山越問題之前列。

亦多已被同化，所謂「變夷而爲華矣」，因此吳國君臣之所以傾力討平，乃因可得其民以爲役使也。¹⁴

20 世紀 20 年代，劉芝祥曾有〈山越考〉一文，認爲山越的來源有三：一是古代越地人民伏處深山未被開化者，二是古代楚國所轄之各族，不易感化，退處深山者，三是戰國以來逃避戰亂而入深山窮谷披荆斬棘之北方漢族人民，劉芝祥對於山越成分之複雜，乃進一步說「抑或爲吳越多山，三國時吳人呼當地居山者之通稱也」。¹⁵而在以上三個來源中，劉芝祥似乎更重視第三者，他說「嗟乎！山越之人，實漢族之最先渡江而南植民者，無殊俄人開闢西比利亞之倭爾賈（Volga）者」。¹⁶

30 年代，日本學者井上晃亦有文論山越之由來，他認爲秦漢以來漢人已佔據江南各要地，到了三國時代，即使山區住民也不一定只有越人，而三國時代的山越有時被稱爲宗賊，其首領被稱爲宗帥，其組織被稱爲宗部、宗伍，此宗字即漢人社會之宗黨，因此他認爲三國時代活躍於史籍之山越，大多是逃往山區假藉越人之名以規避賦稅的漢人集團。¹⁷

50 年代，唐長孺從東漢末年所見山越與宗部的分佈地區幾乎難以分別，以及史籍中常見山越、山寇、山民、宗賊、宗部交錯出現，顯示這些名詞都是山越的互稱，因此認爲山越雖然從稱謂上表示其爲一種種族，實質上除了福建、江西一些偏僻山區之外，只能認作是居於山地的南方土著，其中固然有古代越人的後裔，但與漢人已很少區別，而更多的則是逃避賦役與避罪入山的人民，其組織稱爲宗部，更說明他們實際上是漢末動亂時期以宗黨爲主的自保組織。¹⁸

60 年代，陳可畏認爲，基本上山越的前身是秦漢時代的東越，而東越又是春秋時代越國的遺族。不過，山越也不完全只是東越的後裔，其中有一部分是兩漢時期逃避政府壓迫而入山區的漢人，正是由於這些漢人大批地逃入山越地區，所

¹⁴ 同上，頁 579。

¹⁵ 劉芝祥，〈山越考〉，《史地學報》第 3 卷第 4 期（1924 年 12 月），頁 53-54。

¹⁶ 同上，頁 64。

¹⁷ 前引井上晃，〈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頁 57-68。

¹⁸ 前引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 3-29。

以到了東漢末年，山越便變成一個人數眾多、盛極一時的少數民族。¹⁹

以上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前散見關於山越族屬之研究情形，大致上都認為山越雖有部分古越人之後裔或江南土著，但其中大部分卻是亂世之中開闢山區或逃往山區規避賦稅徭役的漢族人民。其中，井上晃與唐長孺之論點，主要都是從史籍常見宗部、宗賊與山越互稱，而認為當時的宗部、宗賊即山越而立論的。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關於山越的族屬問題又有比較不同的看法。桑秀雲從部落姓氏名稱及其與地名的關係立論，認為宗部雖與山越有密切的關係，但宗部的宗並不是宗黨，而是氏人之一的特定種族「竇」，山越的分布與宗人連接重疊，有若干地名為氏人及竇人七姓中之部落名，因此山越可能為宗（竇）人遷至鄱陽等地以後之餘緒。²⁰然而，把宗部的宗解釋為「竇」，始於清代的校勘學者何焯，²¹但其說法已被惠棟所質疑。²²井上晃與唐長孺也曾從宗部與竇在地域分布上相距太遙遠而加以質疑。²³誠如唐長孺所言，所謂竇人在後漢末年的分布大概只在今四川東部、湖北西部、陝西南部，而宗部的活動卻在長江下游，兩者相距過於遙遠。²⁴此外，井上晃又從宗部與竇兩者的人口數相差太多而質疑兩者的關係。²⁵不論如何，若只從部落姓氏名稱及與地名的關係立論，把山越等同於宗（竇），認為其是氏人之一的特定種族，在論據上確實稍嫌薄弱。

另外，江應梁認為，古代文獻所載的濮和越，基本上是同一個族的不同稱謂，

¹⁹ 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頁 167，收於《歷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²⁰ 桑秀雲，〈宗與山越族屬的探討——氏人的研究之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 55 本 3 分（1983 年 9 月），頁 543-565。

²¹ 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7 月）卷 23：「宗恐與巴竇之竇同義，南蠻號也」，頁 22-23。

²² 惠棟，《後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636 年 6 月）卷 17 補注〈劉表傳〉：「吳志注引江表傳曰：鄱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海昏縣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郡縣，自下言之，謂之宗部宗伍，自上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蠻賊也，何氏之說，為未審矣」，頁 788。

²³ 參見前引井上晃及唐長孺之文。

²⁴ 參見前引唐長孺之文，頁 4。

²⁵ 參見前引井上晃之文。

三國時代的山越，可能就是原先楚國境內遍布江漢以南的百濮的後裔，²⁶然而，吳永章認為古籍所見濮人的分布大多位於江漢之南，而未延及長江下游地區，因此濮與三國時代的山越無涉。²⁷這裡涉及到濮和越的異同問題，如果濮即是越，則江應梁山越是濮人後裔之說並無新意，如果濮不是越，則江應梁之說就難於成立，而目前學界似較傾向於後者。²⁸

如上所述，井上晁、唐長孺、桑秀雲都強調山越與宗部的關係，只是井上晁與唐長孺認為宗部之宗為宗黨，山越是漢末動亂時期以宗黨為主的自保組織，而桑秀雲卻認為宗部之宗為「賁」，山越可能是氏人之一的特定種族賁人遷至鄱陽等地以後的餘緒。然而，關於山越與宗部的關係，也有許多人認為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兩股勢力，並依此主張山越確為古越人之後裔。茲略述如下。

胡守為認為，以往學者常誤解《三國志》中的山賊、山民、山寇等詞都是指山越，事實上山賊、山民、山寇等詞在《三國志》中是泛指山區的叛亂者，其中有山越有非山越。同樣的，山越和宗部的關係也因史籍記載的含混而被誤為一。他認為山越是孫吳境內的少數民族，而宗部則是漢族的地方豪強勢力，東漢末年兩者大多據守深山險要之地，因受孫吳之壓迫而常聯合起來與孫吳統治集團展開鬥爭。²⁹

施光明也認為，把「山民」、「山賊」、「山寇」和「宗部」視為是山越的互稱值得商榷。他從字義上解釋，山越是一個民族的稱謂，而山民則是「入山之民」的泛稱，山賊、山寇也是泛指山區的「叛亂者」，兩者不能視為互稱。山民、山賊、山寇所指的範圍遠比山越廣泛，它包括生活在山區的漢人或豪族割據勢力、山越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至於宗部，也不等同於山越，山越是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少數民族，宗部則是江南由漢人豪強大族統帥而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武裝割據勢

²⁶ 江應梁，〈說濮〉，《思想戰線》1980年第1期，頁60-67。

²⁷ 參見吳永章，〈山越非濮後裔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²⁸ 學界一般似乎較傾向濮與越為兩個不同的民族。參見蔣炳釗，〈濮和越是我國古代南方兩個不同的民族〉，收於氏著，《東南民族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頁52-66。

²⁹ 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於《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

力，也就是江南的塢壁。³⁰

誠然，「山民」、「山賊」、「山寇」僅泛指山中居民及其反叛者，「宗部」應是指依宗黨結合之組織，字義上皆不等同於山越，然而不能僅從字義上論其所指涉之內涵，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還是得從史籍所載之實質內涵來釐清。以下引史文論之。

《三國志·吳書孫輔傳》注引《江表傳》載：

（孫）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遣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³¹

陵陽、祖郎等「宗帥」，能夠「激動山越」，有人認為他們本身就是山越的領袖。³²但有人認為這條史料只能夠說明江東的豪強大族和山越相勾結。³³《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建安八年（203）孫權遣將討伐山寇：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³⁴

有人認為，此處孫權所討伐的山寇即是山越，《三國志·吳書韓當傳》載韓當「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³⁵即說明孫權在鄱陽地區所討伐的山寇即是山越，而江西鄱陽一帶為宗部最盛之地，同時也是山越聚居的地區，由這些史料都說明宗部與山越有時簡直是互稱。³⁶但有人認為，此處孫權所討伐的山寇有山越也有宗

³⁰ 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1期，頁66-69。

³¹ 《三國志》，卷51〈吳書·孫輔傳〉注引《江表傳》，頁1212

³² 參見前引井上晁之文，頁60；唐長孺之文，頁8。

³³ 參見前引胡守為之文，頁7；施光明之文，頁68。

³⁴ 《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6。

³⁵ 《三國志》，卷55〈吳書·韓當傳〉，頁1285。

³⁶ 參見前引唐長孺之文，頁7-8。關於江西鄱陽一帶為宗部最盛之地，同時也是山越聚居的地區，又可參考：袁剛，〈孫吳鄱陽郡宗民暴動及其性質〉，《文史哲》1987年第4期，頁54-58。

部，兩者不同，不能混為一談。³⁷又關於嚴白虎，《三國志·吳書孫策傳》引裴松之的評論：

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白）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³⁸

據此，有人認為嚴白虎是「彊宗驍帥」，即宗帥，在《三國志·吳書朱治傳》又稱之為山賊嚴白虎，³⁹由其與山越之關係可見嚴白虎既是宗帥又是山越之領袖，⁴⁰但有人則認為，嚴白虎只是宗部的首領，並非是山越的領袖。⁴¹

由上討論，可見宗部與山越是否為一，其爭議常在於對史料所載如陵陽、祖郎、嚴白虎等宗帥是否為山越的不同解讀，基本上雙方都不否認宗部與山越關係之密切，只是有人認為兩者本為一體，或屬同一集團，而有人認為兩者還是不同，應該區分開來。

在此隱約可見對山越的認定有所不同，姑且粗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山越論者如呂思勉、劉芝祥、井上晃、唐長孺、陳可畏等人，認為山越的組成分子除了古越人之後裔外，尚包括許多漢人（中國人）因開墾、避稅、逃亡等因素而潛入山區者，其數量可能還超過古越人後裔，且到漢末發展成許多的宗部豪強，縱使是古越人後裔逃入山區者，也已相當程度的漢化而幾乎與漢人無別，因此呂思勉、唐長孺才會說山越大部分是中國人。狹義的山越論者如前述胡守為、施光明以及許多主張山越為百越之一的少數民族者，⁴²認為只有古越人後裔逃入山區者才是山越，其他如宗部等漢人豪強勢力，雖然與山越有密切的關係，但不是山越。

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即古越人後裔逃入山區者是否也有類似漢人所謂「宗部」的豪強勢力？

³⁷ 參見前引胡守為之文，頁 7；施光明之文，頁 66。

³⁸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策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後的評論，頁 1112。

³⁹ 《三國志》，卷 56〈吳書·朱治傳〉，頁 1303。

⁴⁰ 參見前引唐長孺之文，頁 8。

⁴¹ 參見前引胡守為之文，頁 6；施光明之文，頁 68。宋蜀華，《百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7 月），第 4 章第 6 節〈山越〉，頁 144。

⁴² 如注 7 所引陳國強、王文光之書的界說，以及註 41 所引宋蜀華之書的界說。

目前大部分學者都不否認古越人後裔也有許多豪強，前述呂思勉、唐長孺等人一貫主張古越人後裔已漢化而與漢人無別，因此古越人後裔也有許多豪強乃毋庸多言，即使如葉國慶、辛土成、陳國強、王文光、施光明等傾向狹義的山越論者，也都承認山越之中也有許多豪強，不過葉國慶、辛土成認為古越人後裔也有許多豪強在史籍中被稱為宗部、宗伍，他們表面上是取自漢族宗族的形式，但實質上則是山越的氏族或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組織。⁴³如此，則並不把宗部都視為是漢族豪族，而認為有的宗部是山越的氏族或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組織。然而，史籍所見的許多「宗部」、「宗伍」、「宗帥」，如何區別其為古越人後裔的氏族、部落聯盟或是漢人豪強？這是狹義的山越論者未能明確交待的。⁴⁴

三、關於山越的族群意象 (Image)

如前所述，學界關於山越族屬問題的討論，歸結於對山越內涵的認定不同，大致上可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山越包括古越人後裔，以及許多因開墾、避稅、逃亡等因素而潛入山區의 漢人 (中國人)，狹義的山越則僅指古越人後裔逃入山區者。儘管近代學者對山越的認定有以上廣義與狹義兩種說法，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當時的人對山越這一群體又是抱持著何種族群意象 (Image)？以下略探三國史籍所描繪的山越族群意象，由此再討論山越的族群內涵。

基本上，三國史籍對山越之記載都極為簡略，大都如「某某人討平山越」或「山越畏服」、「威震山越」等數語，唯《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對山越有較多的描述，茲摘引如下：

（諸葛）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

⁴³ 參見葉國慶、辛土成，〈關於山越若干歷史問題的探討〉，收於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2月），頁257。

⁴⁴ 宋蜀華認為，避居深山的山越將近300年來與遷入山區의 漢族關係密切，其聚族而居的社會組織，自然不應屬於原始氏族部落，可能類似當時漢族以宗族為核心組成的「宗部」，因而也有被稱為「宗部」的，以致山越首領與漢族大姓首領之間，史書往往均稱「宗帥」。參見前引宋蜀華，《百越》第4章第6節〈山越〉，頁148。

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⁴⁵

按這段史料是諸葛恪自動請纓治理丹楊地區的山越，群臣以為不可。史文雖未明言諸葛恪所欲治理者是山越，但丹楊本為山越大本營之一，再由後來諸葛恪治理丹楊有成，孫權派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的話，也可確認此處所指確為山越：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捍兇慝，又充軍用。藜蓀稂莠，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⁴⁶

以上史料對山越之描述，大致上是指山越居深險之地，其民勇猛，自鑄甲兵，出為寇盜，不受歷代政府統治，一般所謂「逋亡宿惡」等亡命之徒，都加入其陣容。這群人與當時一般郡縣編戶民有很大的不同，令政府萬分頭痛，因此蔑稱之為「藜蓀稂莠」、「魑魅魍魎」，又使用「獻戎十萬」，此種有族類意識的貶詞，無意中亦強調彼此族群之差異。而「逋亡宿惡，咸共逃竄」一句，則常被用來說明山越集團中確有許多一般漢人（中國人）的不法之徒。⁴⁷《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又載諸葛恪治理山越的策略：

（諸葛）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

⁴⁵ 《三國志》，卷 64〈吳書·諸葛恪傳〉，頁 1431。

⁴⁶ 同上，頁 1432。

⁴⁷ 參見前引呂思勉、劉芝祥、井上晁、唐長孺、陳可畏之文。

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⁴⁸

據此，雖然山越居深險之地，但也從事農耕，顯示與漢人在經濟生活上並沒有絕然的差別，或說生產方式並非其族群界線的標誌。儘管如此，史文對山越仍有部分與族類差異有關之用詞，如前述「獻戎十萬」之詞。此處「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一句，說明山越之中有些已「從化平民」，即已受王道教化（漢化）為一般平民，不過這同時也顯示山越之中還有許多「不從化者」，而「不從化者」往往是描述異族之詞。又「逋亡宿惡，咸共逃竄」一句，似乎也在說明一般漢人不法者加入異族山越之中。

《梁書·諸夷傳》有段史料更特別指出山越在體質上較矮小的特徵：

孫權黃武五年（226），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大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⁴⁹

按此處諸葛恪所討之丹陽應即《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所指的丹楊，所虜獲的黝、歙短人，應即指山越。由此史料，可見當時人所見之山越在體質上較一般漢人矮小，此亦可能被當時人用來強化其異族之意象。

另外，還有一些史料，以明確異族之用詞來稱呼山越。如《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黃武元年（222）曹魏大軍來攻：

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孫）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屬。⁵⁰

按此處「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指的是孫吳征討山越之事未平，明確以蠻夷稱呼山越；《三國志·吳書朱治傳》載朱治「征討夷越，佐定東南」，⁵¹此處「夷越」亦指山越而言。諸如此類，史籍對山越之描述，總是充滿著或多或少的「非我族類」

⁴⁸ 《三國志》，卷 64〈吳書·諸葛恪傳〉，頁 1431。

⁴⁹ 《梁書》，卷 54〈諸夷傳·中天竺國〉條，頁 798。按《南史》卷 78〈夷貊傳·中天竺國〉條（頁 1961），亦有雷同之記載。

⁵⁰ 《三國志》，卷 47〈吳書·孫權傳〉，頁 1125。

⁵¹ 《三國志》，卷 56〈吳書·朱治傳〉，頁 1303。

意識，顯示山越集團縱使有夾雜不少漢族人民，但整體上是與一般漢族人民不同，而呈現出一種非我族類的族群意象（Image），這種意象應該不是當時統治者有意的歪曲，而是族群差異所自然的流露。這大概就是狹義的山越論者堅持山越乃古越人後裔的有力依據。

四、山越的分布與族群內涵

那麼三國時代的古越人後裔又是怎樣的一個族群？以下先討論三國時代山越的分布，再分析古越人與山越的族群內涵。

關於三國時代山越的分布，論之者眾，但眾說紛紜，僅列數人之說如下。據葉國慶的研究，山越分布於會稽郡、新都郡、丹陽郡、豫章郡、吳興郡、鄱陽郡、東陽郡、吳郡、廬陵郡等九郡，跨有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地，蓋佔西漢時閩越、東越、南越之舊壤也。⁵²高亞偉認為，山越分布的區域包括會稽郡、丹陽郡、新都郡、建安郡、東陽郡、吳郡、吳興郡、豫章郡、廬陵郡、鄱陽郡、臨川郡等十一郡。⁵³陳國強等著的《百越民族史》則認為，在吳屬的丹陽郡、會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吳興郡、東陽郡、豫章郡、鄱陽郡、廬陵郡、長沙郡、零陵郡、蒼梧郡和夷州及魏屬的廬江郡均有山越居住，即今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台灣、江西、湖南、廣東、廣西等省，這些地區，基本上是秦漢間越和閩越族的舊居地和新定居之地。⁵⁴以上諸說差異，部分是與郡縣改置有關，⁵⁵但最主要的是對山越認定的寬鬆標準不一，如葉國慶認為，《三國志》中稱「山賊者很多」，疑亦是山越，但他並未列入，另列於後參考，其中包括長沙、零陵、蒼梧、桂陽等地。⁵⁶而陳國強等著的《百越民族史》，則將三國時代的文獻中稱「百越」、「揚越」、「夷

⁵² 葉國慶，〈三國時代山越分布之區域〉，《禹貢》第2卷第8期（1934年），頁291-296。

⁵³ 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上、下），《大陸雜誌》第7卷第7期（1953年10月），頁209-212；《大陸雜誌》第7卷第8期，頁238。

⁵⁴ 前引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史》第10章〈山越〉，頁282-288。

⁵⁵ 按吳國郡縣改置頗為複雜，如臨川郡是在建安初年自丹陽郡分出，不久即罷，到孫亮太平二年（257），復以豫章東部析出設立臨川郡。又如建安郡本屬於會稽郡，直到孫亮永安三年（260），始自會稽南部析出設建安郡。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參見前引高亞偉之文。

⁵⁶ 參見前引葉國慶之文，頁296。

越」、「東甌」、「閩越」、「南越」、「山賊」、「山寇」、「山民」、「宗民」、「山夷」者，都視為山越。⁵⁷在此又再次見到山越內涵之分歧複雜。不論如何，大多數學者都承認山越分布極廣，幾乎遍及吳國大部分的領域。那麼，如此廣大地域的人民，若說都是古越人之後，則所謂「古越人」又是怎樣的一個族群？

根據古籍，商周時代已有關於越族的記載，如商湯時有「越漚」，⁵⁸西周時有「越」、⁵⁹「揚越」，⁶⁰但隻言片語，所知有限。春秋晚期，于越後人句踐在浙江會稽地區建立了強大的越國，據《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載，于越為大禹之苗裔，⁶¹但這種附會的說法已為近代學者所否認，⁶²毋寧認為是華夏邊緣人群華夏化的一種策略而已。⁶³後來越王句踐滅吳國，北上中原爭霸，越之名乃大顯於世，並在先秦著作中頻頻出現，⁶⁴如《荀子·儒效篇》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⁶⁵戰國晚期，越國被楚所滅，但越似已成為東南沿海各族泛稱之名，並且出現「百越」一詞，如《呂氏春秋·恃君篇》所載「揚漢之南，百越之際」。⁶⁶戰國晚期到西漢初年，東南各地又出現閩越、東甌（《史記》將閩越、東甌合稱東越，有〈東越列傳〉）、南越、西甌和駱越等與越人有關之國名或族名，其中閩越和南越尤為強大。從南越、西甌和駱越位處嶺南地區看來，越

⁵⁷ 前引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史》第 10 章〈山越〉，頁 281-282。

⁵⁸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台 1 版），卷 7〈王會〉：「越漚，鬚髮文身」（頁 122）。

⁵⁹ 王國維校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西周穆王 37 年：「伐越，大起九師」（頁 7）。

⁶⁰ 《史記》，卷 40〈楚世家〉：「（熊渠）乃興兵伐庸、揚粵（越），至于鄂」（頁 1692）。

⁶¹ 《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頁 1739）。

⁶² 前引蔣炳釗《東南民族研究》，〈“越為禹后說” 質疑——兼論越族的來源〉，頁 1-18。

⁶³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4 月），第 9 章〈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頁 281。

⁶⁴ 前引蔣炳釗《東南民族研究》，〈關於百越民族來源問題的思考〉，頁 27。

⁶⁵ 梁啟雄，《荀子東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12 月），第 8〈儒效篇〉，頁 96。

⁶⁶ 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5 年 8 月），卷 20〈恃君〉，頁 1322。蒙文通認為，《呂氏春秋》此處的「揚漢之南」，不得解釋為整個長江以南，當時長江以南尚有一半為楚人之地，百越只能指東南沿海暨嶺南之地。參見蒙文通遺著，《越史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 月）所收〈越族古居“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 辨〉，頁 1-14。

之概念似乎又比戰國時期更加擴大。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滅南越，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滅閩越，此後不再出現以越為名的政權，但以越之名泛指江南廣大地域之異族的用法，似未中止，甚至更為普遍，東漢末年再出現「山越」一詞，而三國時代山越之分布幾乎遍及孫吳之全領域，都可視為是一種「越」概念擴散之現象。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林惠祥、羅香林等人嘗試以民族學的觀點，把歷史上與越有關之族群，合稱為百越民族，⁶⁷於是以百越為名之研究陸續出現，1980 年中國更成立了「百越民族史研究會」，並陸續舉辦數次「百越民族史學術討論會」，⁶⁸不久，以《百越》為名的各種專書或論文集紛紛出版。⁶⁹在這種學術脈絡下，山越被視為是百越民族的一支的說法，遂成定論。⁷⁰

然而，從前述越族概念變化的回顧，明白顯示「越」並不是一個特定族群，「百越」更不是一個特定族群，「山越」當然也不是一個特定族群，關於這一點，已有不少學者論及，茲略述如下。

蒙文通認為百越非止一族之義，漢代以來學者已多道及。⁷¹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釋「百粵（越）」引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⁷²高誘注《呂氏

⁶⁷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年 11 月第 1 版，1993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把中國民族歸納為幾個系統，其中有百越系統；羅香林《中夏系統中之百越》（重慶：獨立出版社，1943 年 8 月）、《百越源流與文化》（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 年 11 月），更力陳百越皆源自夏民族，並說明越族有許多共同的文化特色。

⁶⁸ 參見陳國強，〈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民族研究動態》1985 年 4 期，頁 1-15。

⁶⁹ 如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2 月）；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百越民族史論叢》（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朱俊明主編，《百越史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 年 1 月）；前引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等著，《百越民族史》（1988 年）；何光岳著，《百越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2 月）；彭適凡主編，《百越民族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前引宋蜀華，《百越》；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編，《國際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2 月）。

⁷⁰ 同註 7。

⁷¹ 參見前引蒙文通遺著，《越史叢考》所收〈百越民族考〉，頁 15。

⁷² 《漢書》，卷 1〈高帝紀〉，頁 54。

春秋·恃君篇》，釋「百越」曰：「越有百種」，⁷³《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⁷⁴蒙文通除引史籍為證外，更從語言與習俗方面，考論百越之地的居民亦非單一民族，他認為越只是南方民族之泛稱，正猶如胡是北方民族之泛稱。⁷⁵

另外，龔蔭、萬斗雲、侯安哲、蔣炳釗亦都從文獻記載、語言、習俗、考古文化差異等方面，論述百越並不是一個單一民族，而是中國南方或東南方各族的泛稱。⁷⁶黃增慶、王克旺、蔣炳釗更對於有些學者所論百越族群有共同的文化特徵提出質疑，指出所謂百越文化也有許多差異性。⁷⁷秦維廉更從人類學觀點，認為越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泛指中國南部和越南北部的人民，不同種族特色、不同語言、不同物質文化、不同社會結構的民族，都可能廣泛地被歸入「越」族，「越」字並不能代表任何較大的人類學結構，如民族聯盟、語系或文化叢，反之，它曾是「南蠻」的統稱，就如同今日「黑鬼」的稱呼用法。⁷⁸

如上所述，既然百越或古越族並不是一個特定族群，那麼，如同百越一般分布遼闊的古越族後裔山越，當然也不是一個特定族群。有些學者曾努力地要指出某地的山越是源於某一支古越人，⁷⁹但這些推論多不免流於揣測，同時更反映出山

⁷³ 前引《呂氏春秋校釋》，卷 20〈恃君〉，頁 1328。

⁷⁴ 《漢書》，卷 28 下〈地理志〉，頁 1669。

⁷⁵ 參見前引蒙文通遺著，《越史叢考》所收〈百越民族考〉，頁 15-25。

⁷⁶ 參見龔蔭，〈關於百越地區與民族問題〉，《昆明師院學報》1984 年第 1 期，頁 21-24；萬斗雲，〈百越的涵義〉，《貴州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74-80；侯安哲，〈從歷史上看百越的涵義及其演變〉，《貴州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頁 23-29；前引蔣炳釗，《東南民族研究》，〈關於百越民族來源問題的思考〉，頁 27-31。

⁷⁷ 參見黃增慶，〈如何理解百越共同文化習俗〉，《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 年增刊；王克旺，〈試論百越文化的差異性〉，《東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頁 114-118；前引蔣炳釗，《東南民族研究》，〈關於百越民族來源問題的思考〉，頁 35-36。

⁷⁸ 秦維廉，〈古越族的人類學定義是否成立？〉，收於《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 年 11 月），頁 146-147。

⁷⁹ 參見楊國宜，〈東吳平定皖南山越戰爭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安徽史學》1960 年第 2 期，頁 24-34；前引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頁 164-167；前引吳永章，〈山越非濮後裔辨〉，頁 23-26；施光明，〈論皖南山越〉，《安徽史學》1986 年第 4 期，頁 8-9；周兆望，〈孫吳時期江西境內的山越及其對經濟開發的貢獻〉，《爭鳴》1992 年第 3 期，頁 58-63；何光岳，〈山越的分布與消融〉，《吉安師專學報》1994 年第 5 期，頁 70-71。

越來源之多元複雜性，證實山越並不是一個特定族群，正如學者安般所言，分布於南方廣大地區的山越，絕不僅僅是某一支越人的後裔，而是居住在山地的各支越人的總稱。⁸⁰而所謂的越人也只是個泛稱，那麼，山越就是當時南方各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總稱了。

五、山越的消失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如前言所述，山越曾長期為孫吳之內患，然而，孫吳滅後，六朝史籍幾乎不再見到有關山越的記載，山越驟然消失，這又反應出何種歷史意義？

孫吳統治時期，全力征討山越，山越之民亦死傷無數，僅就《三國志·吳書賀齊傳》觀之，吳將賀齊在建安 8 年（203）一次討伐建安、漢興、南平的山越行動，就「斬首六千級」，⁸¹建安 13 年（208）討伐丹陽地區的山越，「凡斬首七千」，⁸²建安 21 年（216），又討伐鄱陽地區的山越，「斬首數千」，⁸³諸如此類的殘殺而未被史書記載者一定不少。

然而，山越的消失並非被集體屠殺所致。孫吳政權征討山越的目的之一，是要搜括山越人民以為驅使，所謂「疆者為兵，贏者補戶」。⁸⁴因此每次軍事行動之後，都要大事搜括人口。如前述賀齊討平建安、漢興、南平的山越，「料出兵萬人」，⁸⁵討伐鄱陽地區的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⁸⁶陸遜討丹楊山越，「得精卒數萬人」，⁸⁷諸葛恪治理丹楊山越，山越人民「老幼相攜而出」，「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⁸⁸張承討平長沙山越，「得精兵萬五千人」。⁸⁹唐長孺認為，孫吳如此大量搜括山越

⁸⁰ 安般，〈山越盛衰淺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頁 38-40。

⁸¹ 《三國志》，卷 60〈吳書·賀齊傳〉，頁 1378。

⁸² 同上，頁 1379。

⁸³ 同上，頁 1380。

⁸⁴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頁 1344。

⁸⁵ 同註 81。

⁸⁶ 同註 83。

⁸⁷ 同註 84。

⁸⁸ 《三國志》，卷 64〈吳書·諸葛恪傳〉，頁 1431-1432。

⁸⁹ 《三國志》，卷 52〈吳書·張承傳〉，頁 1224。

人口的目的，是爲了配合其實行的領兵制度與復客制度。⁹⁰不論如何，孫吳爲驅使山越人民，是不可能將山越人民悉數剿滅的，因此，山越的消失並非被集體屠殺所致。

以往學者對山越的消失，大多認爲是融合於漢族之中，只是融合完成的時期稍有不同。譬如施光明認爲，孫吳政權在對山越進行軍事征討的同時，還在皖南山越人民集中的地區設置一系列新的郡縣，安置山越人民，使接受漢族文化和風俗習慣，加速山越和漢族的融合，而這種融合到三國末年就基本完成了。⁹¹陳可畏亦認爲大部分山越都和漢族融合了，但又指出南朝末年及隋唐時期仍有關於山越的零星記載，因此認爲山越和漢族的融合直到唐代以後才徹底完成。⁹²陳國強等人編著的《百越民族史》則認爲，南宋時尚有山越，要到南宋以後山越才從文獻中消失，說明山越已融化於漢族或者改變名稱，成爲其他少數民族。⁹³

然而，誠如前節所論，山越並不是一個特定族群，而是漢末三國時期南方若干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泛稱，基本上此一山越在兩晉之後已消失，南朝末隋唐時期所見零星之山越記載，由於時空相隔久遠，與三國時代之山越指涉未必相同。⁹⁴至於兩晉之後山越的消失，亦不能夠說是融合於漢族所致，因爲兩晉以後南方山區甚至平地都還是布滿著非漢族的各族群。如北齊魏收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載東晉境內的族群：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⁹⁵

這裡顯示東晉境內的族群仍然極爲繁雜，東晉朝廷對這些族群，只能「羈縻而已」，而「未能制服其民」。因此，三國時代的山越做爲當時南方若干族群居住於山地者

⁹⁰ 參見前引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 19-26

⁹¹ 前引施光明，〈論皖南山越〉，頁 11。

⁹² 前引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頁 174-176。

⁹³ 前引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土成等著，《百越民族史》，頁 304。

⁹⁴ 同註 5。

⁹⁵ 《魏書》，卷 96〈僭晉司馬叡傳〉，頁 2093。

的泛稱，可能有部分融合於漢族，但決不可能全部都融合於漢族。那麼，東晉境內這些族群與三國時代的山越是否有某種關聯？唐代魏徵在《隋書·南蠻傳》載：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蜚，曰獯，曰俚，曰獠，曰色，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⁹⁶

按此處所提到的俚、獠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皆為非常活躍的族群，魏徵認為隋唐時代的俚、獠等南方異族（南蠻）是古代百越之後裔，顯示俚、獠等南方各族群可能與三國時代的山越有某些關聯。蓋山越做為當時南方若干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泛稱，其消失既非全數被屠滅，亦非完全被融合於漢族之中，那麼唯一可能就是其後裔轉化以另一種族稱呈現出來，這種族群轉化的現象從近代族群理論來看，是很自然的事情。

傳統的民族史研究，常假設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緣、語言與文化特徵的人群，歷史上各民族分布如同孤島一般，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界線分明，研究者可經由這些客觀特徵來判別族屬。然而，近年來的族群理論則認為，民族是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而非一個特定語言、文化與體質特徵的綜合體，族群與族群之間可能有過渡地帶，或混雜地帶，因此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脫離主觀的認同就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⁹⁷關於族群認同與識別之複雜性，茲以近代中國為例說明如下。

近代中國境內到底有多少民族或族群？清朝末年孫中山倡導革命，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推翻滿清之後，為防各族群之裂解，改為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可見當時一般人認為中國境內主要的族群是漢、滿、蒙、回、藏這五大族群。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奉行馬克思、列寧的民族理論，以史達林所倡導構成民族的四大特徵為判別原則，即共同語言、共同

⁹⁶ 《隋書》，卷 82〈南蠻傳〉，頁 1831。

⁹⁷ 同前引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 3 章〈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頁 61-94。按「民族」與「族群」之定義極為複雜，至今學界尚無一致的定義。王明珂以「民族」對應 ethnos，指一種最大範疇的假血緣人群認同，而以「族群」對應 ethnic groups，指所有層次的人群單位，參見前引書第 1 章〈當代人類學族群理論〉，頁 24-25。本文基本上參考王明珂對「民族」與「族群」之用法，但引用他人論述時，則尊重他人之用詞。

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心理質素，展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調查，結果判定現今的中國竟然多達 56 個民族，但這種民族的識別是由國家介入而通過法令加以認定，仍然遺留許多的問題。⁹⁸近代中國學者馬戎則建議，應稱中國境內有 56 個族群，合稱為一個中華民族，較為妥當。⁹⁹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大規模調查之前許多人並不知道自己的族群身分，起初由於配有少數族群的優惠政策，上報的民族甚至還達 400 多個之多，¹⁰⁰中國境內人群之複雜可見一斑。

王明珂曾在四川北部「羌族」地區從事田野調查發現，近代之前由於族群歧視，北川地區幾乎所有的土著都自稱是漢人，但他們卻被其下游的人群稱為「蠻子」，他們也譏嘲其上游村寨的人為「蠻子」。於是到了 1950 年代的民族識別中，只有最上游少數的「蠻子」很無奈的被識別為羌族與藏族。¹⁰¹王明珂因而懷疑古代真有「羌民族」的存在。他說，近代的「羌族」地區不過只有台灣大小，其族群認同已是如此之分歧，我們怎能相信，漢代魏晉時期分布在青藏高原東緣——由青海到雲南——的廣大「羌族」，是一個其成員彼此認同的民族？的確，並沒有這樣一個「羌民族」在歷史中延續，「羌」只是中國人對西邊異族的想像。¹⁰²

以上族群認同與識別之複雜情形，乃與族群意識的特色有密切的關係。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有如下的共識：「族群」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存在於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中，沒有「異族意識」，就沒有「本族意識」，亦即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¹⁰³此外，即使既有的族群意識，也很容易隨著各種環境因素的轉

⁹⁸ 關於中國民族識別的種種缺失，參見黃光學主編《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4 章、第 6 章。

⁹⁹ 參見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9 月），第 1 章〈前言〉，頁 6；第 2 章〈關於“民族”和“族群”的定義〉，頁 44-45；頁 61-66。

¹⁰⁰ 前引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第 3 章〈族群意識〉，頁 81、頁 90。

¹⁰¹ 王明珂，《蠻子、漢人與羌族》（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 11 月），〈歷史文獻中的羌族〉，頁 19。

¹⁰² 同前引王明珂《蠻子、漢人與羌族》，頁 124。關於羌族只是中國人對西邊異族的一種想像，又可參考前引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 8 章〈華夏邊緣的漂移：誰是羌人〉，頁 227-253。

¹⁰³ 同前引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 1 章〈當代人類學族群理論〉，頁 24。

變而轉變，諸如：意識形態的轉變、政治體制或行政體系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文化生活結構與內容的轉變、人口流動和遷移的轉變等。¹⁰⁴

由以上的討論，再反觀三國時代的山越，許多問題當可迎刃而解。譬如說，關於山越的族群內涵，由上舉「羌族」彼此認同之紛歧，我們怎能相信，分布遼闊遍及孫吳全境的廣大「山越」，是一個其成員彼此認同的族群？因此，山越當然不是一個特定族群，「越」已是當時中國人對南方異族的泛稱，「山越」則是泛稱居住於山地的各種南方異族，其族群內涵之複雜已毋庸多言。那麼，族群內涵如此複雜的山越，經過孫吳政權的全力討伐與統治之後，其各種族裔在後代另以其他族稱被認識，也是很自然的事，前引《魏書·僭晉司馬叡傳》所載東晉境內有巴、蜀、蠻、獠、谿、俚、楚、越等各種土著族群，其中除較偏西南方的巴、蜀、獠之外，其餘或許都與三國時代的山越有某種關聯，應可由此得到理解。

再說，東晉境內的巴、蜀、蠻、獠、谿、俚、楚、越等各種土著族群，其族群內涵又是如何？陳寅恪曾花一番工夫試圖考訂這些族類，但也不得不承認：「古史民族名稱及其界說頗涉混淆，不易確定」。¹⁰⁵蓋這些族稱所指涉的內容是否就是某一特定族群，各族群彼此之間的界限是否涇渭分明，由前述族群理論觀之，都不得不暫持保留的態度，限於篇幅，這些問題將留待另文再做探討。

最後，由以上對山越相關問題的討論，反映出一個有趣的族群現象，亦即史籍有關的族群描述，隨著漢人南向開發之進展而變動。

兩漢以至三國時代之前，中國人對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人群，所知仍相當有限，有時泛稱之為南蠻，¹⁰⁶有時泛稱之為百越，有時甚至蠻越通用混稱。¹⁰⁷不過，

¹⁰⁴ 前引馬戎，《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第3章〈族群意識〉，頁101-107。

¹⁰⁵ 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2年），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年），頁532。

¹⁰⁶ 蠻是古代華夏族群眼中的異族，起初並不限定於南方，大致上從戰國以後，蠻經常被用來泛指南方的異族。參見童疑，〈夷蠻戎狄與東西南北〉，《禹貢半月刊》7卷10期；何光岳，《南蠻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部分第1章〈蠻人的來源和遷徙〉，頁1-9。

¹⁰⁷ 關於先秦至秦漢時期蠻越常通用混稱，參見徐仁瑤，〈“蠻”、“越”關係淺談〉，《吉首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頁25-29。兩晉之後史籍亦常見蠻越連用，如《晉書》，卷42

約從兩漢之後，蠻除了仍保有泛稱用法之外，逐漸被用來專指位居長江中、上游的槃瓠蠻、廩君蠻、板楯蠻等族群，另外又有許多新的族稱出現，如江西、湖南地區出現谿（溪）族，西南地區出現獠族，¹⁰⁸嶺南地區出現俚人，¹⁰⁹起初這些族類似僅侷限於一隅，勢力並不盛大，但兩晉南朝之後，忽然蔚為大族。這種族群擴大的現象，很難相信確為某族之迅速繁衍，毋寧是與漢人對各地加深開發，產生新的族群認識，並在互動關係中激化各土著的族群意識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古代史家在記述這些族群時，未必曾經過一番全面而嚴密的調查，有關描述族群特徵與族群分布的記載，很難據以相信其為當時的族群實態，毋寧說是反映了某一時期的族群觀罷了。

白鳥芳郎曾指出，中國華中、華南和西南地區，自古即住著非漢民族的土著民族群，他們因地域和時代的差異而有各種不同的名稱，由於缺乏從語言學或民族學的觀點加以記錄的歷史文獻或調查報告，要用嚴格的概念準確地瞭解這些土著民族群的實態以及他們之間的親疏關係，有相當的困難，而往往只能得出一些概然性的推論。¹¹⁰谷口房男也指出，由於受史料的制約，要瞭解中國古代的人對民族的認識有很大的困難。他又指出古代中國人認識民族的方法有二，一個是依據華夷思想，略分為「華」與「夷」，另一個是依據是否納入國家權力的統治支配（如編籍、納稅），而略分為「民」、「夷」、「遠夷」，不論如何，某時期文獻所見的民族名稱，也只不過反映該時代的人的民族認識而已。¹¹¹

〈唐彬傳〉：「南臨蠻越」（頁 1219）、卷 65 〈王導傳〉：「竄於蠻越」（頁 1751）。

¹⁰⁸ 一般認為，關於獠族之記載，最早見於西晉張華的《博物志·異俗篇》：「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但未具體交待獠之稱始於何時。與張華同時代的陳壽在《三國志·蜀書·霍峻傳》中，記載蜀漢時便有獠族。成書比較晚的《後漢書·西南夷傳》，則載西漢武帝時就有獠。不論如何，獠之坐大約在兩晉以後。參見前引王文光，《中國南方民族史》，第 3 章〈三國兩晉南北朝動蕩時期的南方民族〉，頁 116-117。

¹⁰⁹ 俚人最早見於《後漢書·南蠻傳》，但《後漢書》成書較晚，三國時代孫吳丹陽太守萬震撰《南州異物志》載嶺南廣州地區有俚人。俚人勢力的坐大，約在兩晉南朝之後。參見張澤洪，〈魏晉南朝蠻、僚、俚族的北徙〉，《四川大學學報》1988 年第 4 期，頁 92。

¹¹⁰ 參見白鳥芳郎《華南文化史研究》（東京：六興出版社，1985 年 9 月），第 2 章第 6 篇〈華南·東南アジアにゆける權力構造形成の基盤——種族集團の民族系譜——〉，頁 395。該文有朱振明節譯，刊於《民族譯叢》1982 年 2 期，頁 42-48。

¹¹¹ 參見谷口房南〈南朝の左郡左縣について——六朝時代における民族認識の在り方を求め

誠然，由前述近代中國族群認同與族群識別之複雜性觀之，古代史家並非今日的民族學家，也不瞭解相關的族群理論，他們在記述各種族群活動時，亦非經由一番全面而嚴密的調查，因此古籍有關族群的記載，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映了某一時期的族群觀。那麼，前述兩漢六朝以來，山越的消失以及許多南方新族群如獠、谿、俚的出現並迅速擴張，除了與族群互動的刺激有密切關係之外，亦可視為是漢人勢力不斷地向南方拓殖，進一步認識南方的土著社會而產生一種族群觀變遷的現象，限於篇幅，在此僅略提這種族群現象，詳情擬留待另文再深入探討。

六、結 論

山越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孝靈帝紀》，元代胡三省認為山越是住於山區的山越人後裔，清代趙翼則認為山越是泛指當時住在深山的南方異族。20世紀前半葉的學者呂思勉、劉芝祥、井上晃、唐長孺等人則都強調，山越雖有部分古越人的後裔或江南土著，但其中大部分卻是亂世之中開闢山區或逃往山區規避賦稅徭役的漢族人民。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民族史學者普遍認定山越是古越人後裔、百越民族的一支。然而，近代學者對山越族屬之爭議，多少與其對山越集團之界定有關，依其寬鬆標準可稱之為廣義的山越論與狹義的山越論。

儘管如廣義的山越論者所述，山越集團之中確實夾雜著許多開闢山區或逃往山區規避賦稅徭役的漢族人民，然而由三國史籍所見的山越，常被描述為化外之民而稱之為「蠻夷」、「夷越」，不論如何，總是充滿著或多或少的「非我族類」的意識，亦即山越的族群意象，整體上是被當時的人視為是非我族類的異族。

由於對山越集團的界定標準不一，學者對山越的分布也有部分差異，然而，大多數的學者都承認山越分布極廣，幾乎遍及吳國大部分的領域。那麼，如此廣大地域的人民，若如狹義的山越論者所說都是古越人的後裔，則所謂「古越人」又是怎樣的一個族群？

根據古籍，商周時期已有越族，但要到春秋晚期越王句踐爭霸中原，越之名始大顯於世，戰國晚期越似已成為東南沿海各族的泛稱，並出現「百越」一詞。

て——》，《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7集史學科篇第29號（2004年2月），頁1-28。

戰國末到西漢初，東南各地又出現閩越、東甌、南越、西甌和駱越等與越有關之國名或族名。從南越、西甌和駱越位處嶺南地區看來，越之概念似乎又比戰國時期更加擴大。漢武帝滅南越、閩越之後，不再出現以越為名的政權，但以越泛指江南廣大地域之異族的用法，更為普遍，以致東漢末年再出現「山越」一詞。

近代學者自林惠祥、羅香林以來嘗試以民族學的觀點，把歷史上與越有關之族群，合稱為百越民族，山越遂被視為是百越民族的一支。然而自漢代以來已有許多學者指出百越族類之繁雜，近代學者如蒙文通等人更從語言與習俗方面，考論百越之地居民文化的複雜性，認為越只是南方民族之泛稱，正猶如胡是北方民族之泛稱，否定百越可做為一具體民族之稱呼。同樣的道理，山越亦只是當時南方各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泛稱。

孫吳立足江南，各地山越反抗不斷，山越成為孫吳之長期且嚴重的內患，然而，孫吳滅後，山越卻驟然消聲匿跡。誠然，孫吳曾全力征討山越，但山越的消失並非被悉數剿滅所致。目前大部分學者對山越的消失，都認為是融合於漢族之中。然而，山越既是當時南方各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泛稱，而兩晉以後南方山區甚至平地都還是布滿著非漢族的各族群，因此山越的消失不能夠說是完全融合於漢族所致。筆者認為山越的消失，只是「山越」一詞用法之消失，原山越之各種族裔在兩晉以後轉化以不同的族稱呈現，史載東晉境內有巴、蜀、蠻、獠、谿、俚、楚、越等各種土著族群，其中除較偏西方、西南方的巴、蜀、獠之外，其餘或許都與三國時代的山越有某種關聯。

兩漢以至三國時代之前，中國人對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人群，有時泛稱之為南蠻，有時泛稱之為百越。兩漢之後，蠻除了仍保有泛稱用法之外，逐漸被用來專指位居長江中、上游的某些族群，另外又有許多新的族稱出現，如谿（溪）、獠、俚等族，起初這些族類似並不盛大，但兩晉南朝之後，忽然蔚為大族。這種族群擴大的現象，可能是與大量漢人南下對各地加深開發，產生新的族群認識，並在互動關係中激化各土著的族群意識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古代史家在記述這些族群時，並非經過全面而嚴密的調查，因此這些記述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映了某一時期的族群觀。兩漢六朝以來，山越的消失以及獠、谿（溪）、俚等新族群的出現與擴張，除了與族群互動的刺激有密切關係之外，亦可視為是漢人勢力不斷地向南方拓殖，加深認識南方的土著社會，而產生一種族群觀變遷的現象。

San Yu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an Kuo) and the Ethnic Phenomenon in the Six Dynasties (Liu Chao)

Leu Chuen-shang

Abstract

San Yue was the largest domestic trouble that Sun Wu,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an Kuo), had to be confronted with as they set up their countr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Jiang Nan). Nevertheless, San Yue, after years of being conquered and ruled by the Sun Wu sovereignty, disappeared all of a sudden. Scholars in modern time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disputed with each other warmly over San Yue's ethnic characteristi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limited definition of San Yue, it could be defined in the broad and the narrow sense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regarded some parts of San Yue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or the Jiang Nan aboriginals, while a majority of them were the Han people opening up the mountain wastelands or fled to the mountains to escape themselves from income tax paying or military service do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or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thought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were real San Yue. However, San Yue, in the historical classics,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uneducated barbarians like Man and Yi. To sum up, people at that time considered San Yue "alienated", not belonging to them.

San Yue, in the Three Kingdoms, was nearly situated in the territory of Sun Wu. Hence, it wa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the residents located in so broad a territory to identify with each other as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Yue, existing in the era of Shang Zhou and in the late Chuen Qiu, was well-known to the public then. What's more,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Zhan Kuo), it seemed that Yue had been a general term for most ethnic groups along the southeastern coastland. Also, the term of “Bai Yue” appeared during that time. Moreover, from the late Zhan Kuo to the early West Han, in the southeastern area, a good many names of states and ethnic groups concerning Yue came into sight. Thus, the general idea of Yue gradually was developed into an alien group residing in the broad territory of Jiang Nan. The term, San Yue, appeared first in the late East Han. During the epoch of San Kuo, all of the races amid mountains, opposing to the Sun Wu sovereignty, were generally termed San Yue.

Scholars in the past thought San Yue’s integration into Han’s society led to its disappearance. Rather, the author finds San Yue’s joining in Han’s society as a whole impossible. In a way, the term of San Yue was out of use, accordingly, 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ace. That is, various kinds of San Yue ethnic groups, after the times of Liang Jin, underwent a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with miscellaneous ethnic designations. Such ethnic transformation phenomenon, surely,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ost Han people’s deepening development in Jiang Nan after their moving southward, bringing about a new ethnic recognition as well.

Keywords : San Yue ethnic relationship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an Kuo)
the Six Dynasties (Liu Chao) the Sun Wu sovereignty